

長春文史資料

一九八八年 第五輯

《長春文史資料》編輯部

1988年第5辑

(总第24辑)

長春文史資料

目 录

我对汉俊的点滴回忆-----	薛文淑 [1]
徐寿轩同志传略---	秀 峰 [8]
第一位走向解放区的大学校长----	常城 范宏光 [20]
张国珍小传-----	史素琴 [36]
锡伯族第一个女大学生---	徐树栋 [42]
市工商联第一任主委——胡占波——	徐一夫 [50]
解放前的长春商会-----	徐一夫 [69]
长春新力棉纺厂厂史略闻-----	杨孝侯 [85]
长春玉茗魁史略-----	中国樑 [103]
与众不同的“真不同”-----	徐一夫 [116]
世一堂的学徒生涯-----	郑长善 [122]
吴恒夫烈士与“四一四”战役-----	贺庆积 [127]
曾泽生舌战方特使-----	尹秉义 [139]

兵火春秋——————全永顺〔144〕

中央银行本票——————张庆文等〔152〕

难忘的一九四八年——————心铭等〔181〕

两封加急电报——————郭献德〔320〕

北辰同学会与王家善率部起义——————刘凤亭〔183〕

“九一八”事变长春沦陷和伪满成立见闻——王振中〔243〕

溥仪居津轶话——————罗继祖〔256〕

祭祀府杂忆——————王洪泽〔262〕

伪满皇帝的掌印机关——“尚书府”——沈信夫〔280〕

溥仪和红卅字总会——————郝幼权〔281〕

“新京”诗人眼见耳食录——————郝幼权〔286〕

长春孝子坟——————焦英棠〔299〕

惑世盗名的李孝子——————王传业〔310〕

孝子坟神道碑——————郝幼权〔318〕

我对汉俊的点滴回忆

●薛文淑

汉俊离开我们已近60年了！

最近几年常看到一些提到他的文章，有的出入很大，我是他的嫂子，感到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关于他的情况写下来。

李汉俊是我爱人李书城的小弟（原名书序）。1920年我从家乡松江到上海念书，由父亲的朋友介绍寄居在他们家里，那是一所上海称之为三楼三底的房子，座落在法租界三益里。当时黄兴的遗孀徐宗汉住在贝勒路的一处房子，请了一位湖南老先生当家庭教师，我便同她的子女一美、一球等一起从老先生补习功课，准备考学校。不久我上了民生学校，与邵力子的姨妹王秀珍同学，邵家住在我们的斜对门。

书城当时是广东军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并任遣送敌侨事务局兼管理敌财产事务局的督办，因为没有什么具体工作而常住在上海。汉俊这时已经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大，回国后与书城住在一起。那时与他们同住的家属有母亲王氏，书城的长女声韻、次女声謩、次子声茂（后改名声宏）和汉俊的两个孩子声资、声猷。书城的长子声华在日本念书，曾于1920年的夏天回国探亲，在三益里小住一段时间即返回日本，几年后他毕业回国我们才又相见。

在三益里居住时，书城与外界往来甚少，不大出门，来访的人也不多，整天在家看书。汉俊则与他相反，每天都很忙。他住在旁边楼下，我住中间楼上，常常能见到朋友们找他，经常来的多是与 他年令相仿，穿长袍的先生，也有一两位比他年长，还有两位剪短发穿裙子的青年女性给我印象较深，但除了邵力子以外，其他来客我都不知道姓名。

我是刚从家乡来到上海的，对外界一无所知，更不知道革命之类的事。但是我觉得汉俊的这些朋友很异常，他们在一起经常发生争论，有时象是在吵架，我以为一定是闹翻了，可是第二天这些人还是照常来，从表情上看不出有什么不愉快。他们常深更半夜才出门，总是弄得声响很大。我对这么多人来找我感到奇怪，书城说：“汉俊他们的事，你不要去管。”可见他对汉俊的事是有所了解的。

书城早年投身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但他对以后袁世凯篡位、国民党的退计及军阀混战的状况深感失望，遂将希望寄托在他弟弟身上。早年因家境穷困，汉俊从小就受到书城照料，并随他去日本读书。汉俊以优异成绩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毕业后，因为国内根本没有搞建设的条件，便从事革命活动。对此，书城不仅不加以干涉，而且总是予以鼓励和支持。他们两人的性格都很直，脾气都不好，但他们之间却很友爱和和睦。书城母亲的规矩很多，她特别喜欢清静，对别人走路的要求是“轻手轻脚”，说话的要求是“轻言细语”。我们全家一日三餐都是在一张大桌子上，大家都遵守母亲“食不言、睡不语”的规定，能够轻声说话的只有书城兄弟，他们总象是讨论什么似的，一般都是汉俊先说些什么，然后书城表示同意。汉俊对他的哥哥十分尊敬。

1920年秋天，母亲要送三个灵柩（书城、汉俊的父亲及他们

二人的前妻）回湖北潜江老家安葬，同去的有汉俊、声簧、声茂、声馥、声謨。由于家里人口减少，而且房租较贵（每月需七八十元），就把家从三益里搬到贝勒路街德里106号（即现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纪念馆址）。这是一所两楼两底的房子，我和书城1921年春结婚（他的前妻甘世瑜是1917年患肺病去世的）后住在西边亭子间，前面房间是我们会客的地方。汉俊住在东边楼上，他的一间房隔为两间，前面为卧室，后面放箱子等杂物，还设有洗脸架。其后面的亭子间是声馥和娘姨（30多岁、安徽人）住。东边楼下置一长桌为饭厅，饭厅后边的房间是洗澡间，各有日本式的洗澡大木桶。西边楼下前面房间是警卫梁平（20几岁）和一位性廖的厨师（40岁左右）的住所，后面为厨房，前后房中间为过道，上楼只有一个共用的斜度较大的楼梯，上楼时能看见饭厅（因饭厅上半截为木条网格），而且必须经过汉俊的房间才能到达我们屋内，大门从来没有开过，进出都走后门。

我当时在博文女校读书，中午回家吃饭，下午放学回家后除了看电影以外，一般都呆在家里复习功课。我发现搬到新居以后，汉俊的朋友比三益里时来得更多了，几乎每天不断，还增加了外国人，人少时就在他的房间，人多时就在饭厅。但我在三益里见到的两位女性都不见来，而换了一位长得挺漂亮的陈小姐经常来找他学外语，我们还以为这一定是未来的弟媳。汉俊白天也常出门，不然就是在家里写东西，晚上客人走后他仍要写得很晚才睡。我很奇怪他哪来的那么多精力。他吃饭也总是匆匆忙忙的，好象是完成一件任务。有一次我们因为饭做生了没有吃，但他已经吃完了，还说：“我怎么没有吃出来呢？”还有一次吃饭时他见我戴了项链，便毫不客气地指着说：“你这不是把自己锁起来了么？”我听后就再也不戴了。

汉俊童年就去日本留学，一直到大学毕业才回国，但他却没有一般留过洋的人的那种“洋派”，平时老是穿着布长袍，在家与书城一样有换上日本和服的习惯，据他们说是因为穿上比较舒服，除了一付金丝眼镜外，看不出是一位大知识分子。他生活简朴，除了抽香烟而外别无嗜好。他平时寡言，好象不善于谈吐，但他和朋友在一起时则总听到他滔滔不绝地谈。

党的“一大”是在我家里召开的。当时书城不在上海，到湖南主持讨伐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军务去了，随去的有警卫梁平。我与声韵在上海，此外家里娘姨和厨师，连汉俊共5人。

党的“一大”的召开，当时我并不知道，因我文化程度低，对革命并无了解。而且汉俊和朋友们常常在家聚会，都可称是开会。我只是记得有一天，我回到家，一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厨师老廖告诉我说，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二先生（指汉俊）的房间，并说没有抓人。这时汉俊已不在家，我上楼到他房间看了一下，除了书架上的书比较零乱以外，没有别的迹象。其他房间据老廖说连进都没有进去。因为书城曾对我说过“你少管汉俊的事”，所以汉俊回来后我没有问，他也没有提这件事。后来回想起来，那次可能就是在开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解放后，看到有些人的回忆文章说“一大”是在楼上开的，也有的说是在楼下开的。虽然“一大”开会时我既没有看见，又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那个据说是开会用过的长桌一直是放在楼下的，因为楼梯狭窄，长桌不可能搬到楼上来，而且楼上也没有可容纳这张桌子的地方。

前几年我看到李达夫人王会悟同志的回忆文章说“一大”是她找到李汉俊商量供他哥哥的客房作为会场的，说是因为李书城到外地去避暑，客房空着，还说李汉俊听了，怔了一下（在另一篇回忆里，她又说“李汉俊一口答应了”）。这件事我认为

她讲得不大合理，首先，根据许多当事人的回忆，李汉俊当时是筹备“一大”的负责人之一，曾接待过马林、张国焘等先期到达的与会者，并给在广州的陈独秀去信要求派代表来参加“一大”，安排在自己家里开会的事完全可由自己作主；其次，汉俊与书城一直同住一处，开会用的饭厅是全家共用的地方，不是什么书城的客房，否则巡捕也会搜查书城房间的，书城当时也并非外出避暑，而是赴湘请兵援鄂。此外，汉俊不愿和不敢在自己家里开会的，因为过去就常有人来家“开会”。王会悟还提到，“一大”在楼上举行时，她在楼下放哨，突然有个陌生人从厢房出来向楼上走，王问他找谁，李家厨师告诉王“他是侄少爷的朋友”，其实所谓侄少爷声宏或声簧当时都年仅6岁，而且早已随祖母回老家去了，难以理解的是当时我们彼此没有见到。

这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汉俊要离开上海去湖北，临走前交给我一张当票说：“你以后有钱就把它赎出来，没钱就算了。”他走后，书城托小姑爷（张国藩）接我全家去武汉。行前，我拿100元钱去当铺把东西赎出，原来是他亡妻遗下的首饰，这些首饰以后汉俊又给了后来的妻子。当时我很纳闷：汉俊在外据说是教书，又写文章，总该有点收入，而他从来分文不交给家里，连他的孩子的全部用度都是由书城供给，他生活又简朴，几乎一日三餐都在家里吃，没有什么用钱的地方，何至于还要去当铺？现在我想他的钱大概都用于革命之需了。

约1923年初，我们也到了武昌，住在牙厘局街。母亲、汉俊及孩子们已先于我们住到那里了（书城当时在北京）。我和声韵住前后房，汉俊住对面，他在学校里教书，和从前一样忙。

阴历年前，汉俊经书城的朋友万声扬（武定）介绍和万的妹妹陈静珠结婚。书城从北京赶来主持婚礼。婚礼是在武昌青年会举行的，参加的约有二三十人。汉俊因为没有象样的衣

服，就穿上书城亡命美国时做的燕尾服。在婚礼进行中，有人提出要新娘报告恋爱经过，新娘小声说：“请汉俊代答。”汉俊说：“我和新娘今天是第二次见面，不知道她要说什么，请诸位原谅。”大家一笑了之。汉俊与他前妻（姓陈，已去世5年多）感情很好，过去大家劝他续娶，他就声称对方一定要姓陈，而且要志同道合；并且说如果找不到这样的，就找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陈静珠连字都不认识，并且是一双“解放脚”，还带着耳环、手镯、戒指“全付武装”，我们曾为他们是否能合得来而耽心，可是，出乎意料之外，他们之间的感情却一直很好。他们婚后不久，书城便回北京去了。

一天深夜，家人都已睡熟了，突然听见有人急促地敲汉俊的门。我开了一道门缝瞧见一个身着短褂工人模样的人，提着马灯轻声喊：“李先生、李先生，赶快离开这里。”不一会儿，汉俊便和那人一起出门走了。第二天清早我发现有一个形迹可疑穿长袍的人老是在街的对面（街很窄）走来走去。隔了几天汉俊才回家。阴历年后，不知什么原因，汉俊也只身去北京。

不久，我们全家迁往北京，住在丰盛胡同。汉俊在外交部工作，干秘书或是翻译之类的事。这时全家用度每月需200元左右，还是由书城负担着。1923年夏，汉俊曾回武汉在一所大学教书，他离开后不久我们就搬到榆钱胡同去住，书城任陆军总长时就住在这里，辞职后又搬到按院胡同，临走时提出把孩子（声簧、声馥）带回武昌去读书，他们一家便去武昌。后来汉俊又独自来过北京一次。

1926年，我们也回到武昌，住在水陆街；汉俊一家住在三道街，彼此经常往来。不久汉俊任省教育厅长，詹大悲任财政厅厅长，与他交往较多，并同我们认识的耿丹交往甚密。

1927年国共分裂。冬，胡宗铎、陶钧的军队来到武汉。书

书城提出要汉俊和詹大悲去日本避难，并给他 200 元现洋让他先去上海，汉俊说要等陈静珠生了孩子再走，而避居日本租界。我们当时也已迁居汉口汉中胡同益寿里。一天晚上，陈静珠突然来我家哭着说汉俊被抓走了。我马上坐人力车去大智门一家旅馆去找书城（他和孔庚躲在那里）。书城听到这消息后说：

“你先回去，我马上就回来。”但我刚到家不久，本家老爹（李万青）跑来告诉我说：“大先生（指书城）和孔庚一起被抓走了。”并说是关在卫戍司令部的楼上。我当即去找耿伯钊（耿丹之兄，当时是汉口的一个局长），他表示没有办法，看样子他也很害怕，这时真是晴天霹雳、无法可想。后来因为书城和孔庚都是国民党的元老，经冯玉祥、程潜等人多方营救才免遭毒手，但被关押了 100 多天。可是汉俊就在被抓去的当天未经任何审讯被枪杀了，与他一同遇害的还有詹大悲。后来听说汉俊与詹大悲被抓前正在下棋，还有一位危诰生先生在旁观棋也被抓走，以后亦遭杀害。

汉俊的尸体陈放了几夭，不准亲人收尸，还是由书城的副官周惠年（后改名周辉林）冒着生命危险去收尸的，先寄灵于武昌大东门长生观，于 1932 年才由书城出面将汉俊遗体安葬在武昌卓刀泉的庙后（现由政府修建为烈士墓）汉俊死后不久，陈静珠生了一个女孩，我替她取名声翥。

书城失去了他亲爱的弟弟，痛不欲生，一提到汉俊就悲愤万分，一直想复仇，但几次反蒋都没成功，长时期精神苦闷，以学佛来求得解脱。他将希望寄托于下一代，将声簧带到上海读书，以后，声簧、声宏、声华都先后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继承了汉俊未完的革命事业。

薛文淑 1983 年初稿 李声芳 1985 年 2 月整理

（市民革供稿）

徐寿轩同志传略

秀 峰

法国巴黎机场。

一架巨大客机将从这里飞往香港。

前往亚洲的旅客随检票的铃声步出候机大厅。一位西服革履、结着深红色领带、面部黄色皮肤的人怀着急切的心情向舷梯口检票的法国女郎望去。他是嫌这位女郎检票速度太慢了，他恨不得一步登上客机飞往朝思暮想的祖国——中国。

这位就是国民党中央派往法国的中国留法研究生徐寿轩。

当客机带着使大地为之颤栗的吼声挟风呼啸而起，穿过云层上空，飞行在碧蓝如洗的蓝天时，他轻松地呼一口气。时间：1937年。中国正处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徐寿轩此去法国留学7年。对这位1925年加入国民党、当过“三大”代表的老国民党员，此行归来当然必有重用。

然而，徐寿轩回国后，毅然抛弃官职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投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怀抱，开始了革命的生涯。

破落的家境迫使他不得不愤发

1897年6月15日，徐寿轩出生在辽宁省辽阳县徐坨子村。徐寿轩的祖辈是在清朝初年由关内迁往辽宁省辽阳县徐坨子

村的。当时徐家有土地数百亩。到了寿轩父亲这辈，家业逐渐衰落。寿轩5岁时父亲病故。母亲只好领着5个儿女过着凄凉的日子。母亲是位刚强妇女，宁肯家中拮据，也要从口里节省出几个钱，供孩子念书。徐寿轩10岁，拿起了书包。他每天放学回家看到母亲身穿破衣，不辞辛苦地操劳，总是放下书包操起工具替母亲分担一些家务。寿轩发愤读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中学毕业前，县里要送一名官费留学生去日本，但必须经严格考试。徐寿轩报名应试。在几千人中才拨出一个的竞争中获胜！晚上回家一进门，母亲一下子把寿轩抱住了，眼里含着幸福的泪花，激动地告诉儿子：“轩儿，留学日本真的考中了！”寿轩把母亲搂得更紧了。

1917年10月，徐寿轩乘坐一艘大型客轮离开了祖国。

客轮喷着黑色的烟柱，迎风破浪航行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上。徐寿轩站在甲板上，眼望大海，脑海里想着临行前母亲的句句叮咛：“读好书，光宗耀祖……”

当徐寿轩踏进日本东京大学就读后，他没有心思观赏异国的庙宇，也没有被这异国风光所陶醉。他没有辜负母亲的希望，刻苦学习，埋头读书，加上他记忆力惊人，在留学生中的成绩又是名列前茅，外国的留学生对徐寿轩也不得不刮目相待。

政治风暴吹醒了他的头脑

正当徐寿轩孜孜求学之际，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

这起震撼人心的消息，使身在异国它乡的徐寿轩开始从埋头读书、光宗耀祖的个人小天地走出来了。正在他思想模糊、举棋不定之时，一个人出现在他的面前。此人就是留日学生杨绍棠。杨绍棠在国外，凭他政治上的敏感，总想拉起一个团体，

跟随孙中山走反帝反封建的路。正在这时，他听说日本大学来一位中国留学生徐寿轩学习甚佳，很为敬仰，便前来拜访。久而久之，徐寿轩被杨的与祖国航船同命运的思想所感染。是的，如果把祖国比作是一艘航船的话，我们就是坐在航船上的中国人。航船上每一个人的命运怎么能离开这艘航船呢？这形象的比喻，使徐寿轩又回忆起乘坐海船飘洋海上的情景。假如我乘坐的那艘船沉没了，个人不也就沉到海底了吗。这与中国古代的一句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是一样的。

紧接着从中国又传来了“五·四”运动的消息。徐寿轩的脑子更清醒了。这一天，徐寿轩与参加孙中山同盟会的杨绍棠又谈到深夜。想起自己身居日本仍为个人读书，实为渐愧。于是有了“回到自己祖国去！离开日本帝国主义国土！弃笔从戎，报效国家”的想法。他很赞成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政治纲领，渴望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

1920年，徐寿轩怀着报效祖国之志，离开日本回国。当时国内军阀混战，哪有他立锥之地呢？为了寻找政治出路，一边在沈阳一家兵工厂做工，一边注意政治形势。这家兵工厂是英国人开办的，工人整天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干活稍微慢一点，不是遭到英国人的唾骂，就是惹来一阵拳打脚踢。一天，厂长看徐寿轩工作慢慢腾腾，直冲徐寿轩面前，劈头盖脑地训斥道：“他妈的，磨什么洋工！”徐寿轩怎能容忍一个外国人任意辱骂呢，胸中的烈火立即燃烧起来，直冲厂长，用英语对骂起来，之后当场辞职。工人们很赞佩徐寿轩的骨气。

这件事不知怎的让当时在河南省政府任顾问的杨绍棠知道了，马上写信给徐寿轩，让他速来河南。徐寿轩从东北坐上火车，穿过山海关，转道河南。

两人见面，异常高兴。寒暄一阵，杨绍棠马上把让徐寿轩赶来的意图讲了：河南省政府正在谋划攻打山东军阀张宗昌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眼下正缺人筹备经费。徐寿轩一听说攻打军阀，他高兴地应允了。

在河南，徐寿轩一直住在杨绍棠家里，这样他结识了一些国民党员，他了解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是反对军阀统治的，加上孙中山的一些主张正中他的心意，毅然加入国民党。时间：1925年。之后，徐寿轩又回沈阳，为反对军阀积极筹备经费。

1926年，广东革命政府派了5名黄埔军校毕业生为特派员，到东北开展地下工作。为避免奉系张作霖的迫害，徐寿轩在沈阳车站不远的地方租用几间房子作为他们的活动的场所。不久，张作霖的城防司令侦知他们的革命活动，将要进行逮捕。幸亏这个城防司令的参谋处长是徐的同学，紧急告诉他们，才逃出沈阳到大连躲避。后徐寿轩托张学良的老师说情才算无事。1928年奉天省国民党党务整理委员会成立，徐寿轩被选为委员，任训练部长。同年，南京国民政府进行第二次北伐，主要是进攻奉系军阀。国民党中央命令党务整理委员会在东北进行军事配合。

拒绝参加“三大”奔赴法国留学

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所有代表均由国民党中央指派。国民党中央给奉天省6名代表，即：王树常、朱光沐、彭志云、刘不同、王治安和徐寿轩。

开幕那天，别的代表都迈入会议大厅，独独不见徐寿轩的影子。

这时，在大厅走廊里有一个人，东张西望，脸上露出焦急的神态，此人就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

他问奉天省代表：“徐寿轩怎么没来？”

“他有病现住在医院。”

徐寿轩果真病了吗？不，是他心里有“病”。

徐寿轩加入国民党后，一直信奉孙文主义。但是，孙中山1925年病逝后，蒋介石在1927年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徐寿轩目击了这次惨杀，发出无限感慨，心里逐渐产生一连串的问号：

既然国民党反对军阀，为什么蒋介石总与军阀勾勾搭搭打得火热？

为什么国民党在南方屠杀共产党，而奉系军阀在北方又逮捕李大钊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这不是有计划有预谋干的吗？

尤其是看到党内各派势力尔虞我诈、争权夺势，更加反感。“四·一二”大屠杀，使他更看清了国民党右派势力假革命真反共的面目。所以根本不想参加国民党“三大”。个人的飞黄腾达、荣华富贵他根本不考虑。徐寿轩是一个硬汉子，认准真理就要坚持下去，刚直不阿几十年。后来，经人一再劝说，他才勉强从奉天动身来南京，并以突然有病为由，住进南京鼓楼医院，回避参加国民党“三大”。

陈果夫当然不知道徐寿轩此时的心理变化，听说徐寿轩正躺在医院，立即派人前往医院探望。会议已进行两天了，徐寿轩仍然躺在病床上。第三天，陈果夫竟亲自前往医院。他坐在病床前，边问病情边看病历，知道徐无有大病，心里明白三分。一再劝说病好一点尽可能参加后几天的会。对陈果夫的用心徐寿轩心里当然明白，抬举我徐寿轩的本意，在抬举他自己。事实正是这样，陈果夫之所以拉徐寿轩，是为了在东北发展他的势力，增强与胡汉民相抗衡的力量。国民党“三大”应

选中央委员36人，候补中央委员18人，陈、胡均想包办。陈果夫为在东北安插他的亲信，想方设法拉一名东北代表进入中央委员会，但是党章规定，中央委员最低年龄为30岁，而在东北的陈果夫的亲信中没有年令达到30岁的人，只有徐寿轩是31岁，所以陈果夫不得不把徐寿轩的名字列在他想包办的36名中央委员名单中，可是陈果夫哪里知道徐寿轩早已经从心里与他们分手了。

在医院里，徐寿轩听到国民党政府将派他到法国留学的消息，心想，这不正是脱离国民党的良机吗？如果执意不参加“三大”，必然取消出国的资格，所以来个脱身之计，只参加后几天的会。会议上，徐寿轩多方活动，不要选他为中央委员，结果如愿了。

会议结束后，徐寿轩立即返回奉天。准备前往法国。

放弃资产阶级社会学研究 宣传抗日、反蒋、民主

巴黎，世界革命的圣地。

客机飞临巴黎上空，徐寿轩心情格外激动。艾菲尔铁塔，巴黎的标志，这是为了纪念抵抗凡尔塞反动军队牺牲的巴黎儿女建造的。塞纳河，巴黎公社社员的鲜血染红了它。“冲天的巴黎人”浮雕像群，那是为了纪念为捍卫自己祖国而献身的志士……徐寿轩想起一位伟人论述巴黎历史作用时说过的话：“在这个城市里，欧洲的文明汇集了整个欧洲历史的神经纤维，每隔一定的时间，从这里发出震动全世界的电击。”是的，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所开辟的72天不可磨灭的历史，不就是震动了整个旧世界的雷鸣和电击吗？

徐寿轩虽然对巴黎的历史有所了解，但还没有进行更深的探索、研究。这次他进入巴黎大学文科研究院研究资产阶级社

会学，想从中找出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徐寿轩于1929年10月飞抵巴黎。当时国民党在巴黎设有驻欧总支部和驻法分部两个机构。他到法国后，并没有去报到。直接到大学就学。他先学习一段法文之后，即开始研究资产阶级社会学。1930年春，国民党驻法国分部改组选徐寿轩为委员，他毅然回绝。1931年9月，设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举行每年一次的大会。徐寿轩想，这不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学研究的现象吗？于是，他多方活动，亲自到国联请得一个记者证，列席了这次大会。在大会进行中，中国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徐寿轩听到家乡已沦陷，蒋介石拱手将东北的大好河山送给日本侵略者，悲痛万分。一天，他听说国际联盟召开大会讨论“九一八”事件。经过一番周折，他以巴黎大学研究员的身份，独自去国际联盟，他把希望寄托在国联上。可是会议讨论几次，毫无结果，他对国联失望了。国破家亡揪着这位在异国它乡的留学生，他再也没有心思研究资产阶级社会学了，他要走出去，为拯救自己的祖国而奔走呼号。

当年11月，他听说国联理事会在巴黎又开会，研究划锦州为中立区的问题，因为国民党政府代表有同意的表示，激起了聚集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的愤慨。徐寿轩带领中国留学生闯进国联理事会会议厅抓住中国首席代表施肇基严厉质问，施迫于压力，使理事会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提案没能通过。

1932年春，国联又召开裁军会议。徐寿轩又以记者的资格去列席，各国代表拍桌子争吵好几天，都想裁别国的军队，不想裁自己的军队。毫无结果，不欢而散。

徐寿轩参加几次会议，清醒了：国联是帝国主义操纵的，根本不能维护弱小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他十分苦闷，一方面对国联失望，一方面对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不满。国家处